

【是谁改变了中国】丛书

单秀法 著

谁使中国醒过来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使中国醒过来/单秀法著.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1

(是谁改变了中国)

ISBN 7-5013-1537-X

I. 谁… I. 单… III. 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 N. D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6093 号

书名 谁使中国醒过来
SHUI SHI ZHONGGUO XINGCUOLAI
著者 单秀法

出版发行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北京市双桥威宁侯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10 (千字)
版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书号 ISBN 7-5013-1537-X/K · 281
定价 18.00 元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沉睡的中国	(1)
一、历史的成就造成历史的衰落	(1)
二、华夏夷狄说和天朝王国论	(5)
三、礼仪之争的背后是平等地位之争	(10)
四、科学技术的显示和奇技淫巧之评价	(19)
五、沉睡的中国	(27)
第二章 先知先觉的三个人	(33)
一、龚自珍：“天朝王国”梦境中醒来的 第一人	(34)
二、林则徐：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42)
三、魏源：提出“师夷”纲领的第一人	(49)

第三章 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回应	(62)
一、懵懂应战，荒唐对敌	(63)
二、“上持国体，下顺夷情”的对外方针	(69)
三、由“以商制夷”到“以民制夷”	(73)
四、整顿在原有的轨道运行而落空	(78)
第四章 中国人的第一次觉醒	(84)
一、太平天国的惊世作用	(85)
二、火烧圆明园的巨大刺激	(91)
三、洪仁玕和《资政新篇》：以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施政纲领	(97)
四、冯桂芬的文化论纲：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102)
第五章 觉醒后的行动：奕訢和洋务运动的发动	(111)
一、奕訢：未能当上皇帝的恭亲王和议政王	(112)
二、“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外交路线	(117)
三、“探源之策，在于自强”的振兴纲领	(123)
四、围绕自强所展开的新政	(129)
第六章 思想解放的大讨论	(138)
一、两个外国人的建议和内外政策大讨论	(139)
二、一波三折的教育改革大讨论	(147)
三、中西文化冲突的困惑	(159)

第七章 王韬、郭嵩焘对“中体西用”的怀疑和批判	
.....	(167)
一、王韬对“中体西用”的怀疑	(168)
二、郭嵩焘对“中体西用”的批判	(185)
三、郭嵩焘对欧洲政治的考察和研究	(194)
第八章 “中体西用”梦幻的破灭	(202)
一、“中体西用”的内在矛盾	(203)
二、洋务运动夭折的理论分析	(208)
三、甲午战争使国人从“中体西用”的梦境中醒来	(221)
第九章 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的资产阶级改良说	
.....	(232)
一、进化论代替了变易观	(232)
二、冲决封建伦理网罗的“仁学”	(241)
三、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全变说	(258)
第十章 孙中山：把觉醒的国人带入二十世纪	
.....	(271)
一、是改良，还是革命？	(272)
二、排满和反帝	(287)
三、反对资本家，非反对资本	(301)
参考书目	(311)
后记	(313)

第一章

沉睡的中国

17世纪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为什么仅仅经历100多年的衰落，至20世纪竟成了世界上最落后、最贫穷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中国昔日的命运会不会有一天成为现在发达国家的命运呢？中国经历20世纪的奋斗，会不会在21世纪迎来她的再度辉煌呢？

一、历史的成就造成历史的衰落

马克思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大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

2 谁使中国醒过来

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①“为什么中国直到 16 和 17 世纪仍能以大量的发明和讲究文明领先于西欧而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为什么随后它却让别国赶上，然后被人超过，而到 19 世纪它的部分领土竟像由停留在石器时代的部落居住的地方一样沦为殖民地呢？以至到了 20 世纪，它竟成了世界上最落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某些国家又是如何‘觉醒’的，而其他国家——或者就是那些醒了又睡回去的国家——为什么，又是如何‘沉睡不醒’的？中国昔日的命运会不会有一天成为我们的命运呢？”^②这是阿兰·佩雷菲特的问题。

佩雷菲特先后在法国三任总统戴高乐、蓬皮杜和德斯坦时期担任过七任部长。1971 年他率领法国议会代表团访华，回国后出版了《当中国觉醒时……》一书（1973 年），到 1980 年该书出新版时，仅法文版就售出了 150 万册。为写《停滞的帝国》，作者从 1980 年至 1988 年先后 6 次访华，搜集了 1.2 万多页原始资料。上述一连串的问号正是他写作此书的动因，也在此书作出了他的回答。佩雷菲特的先辈、他的法国先皇帝拿破仑读了有关介绍中国的书后，说出了留传千古的名言：“当中国醒来时，世界将为之震撼。”对拿破仑的名言，中国人是津津乐道的，时时企盼着东方睡狮醒来，去震撼世界。而马克思的同乡并其思想来源者之一黑格尔——这位辩证法的大师却说出了令中国人不快的名言：“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37 页，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

^② 《法》阿兰·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 13 页，三联书店 1993 年版。

着个人的思想。这个暴君通过许多等级领导着一个组织成系统的政府。……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教授讲：“幅员广大、自给自足、统治阶级的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所有这一切使清帝国在与西方国家接触时毫无应变的准备。更确切地说，当这种接触在近代成为事实时，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要理解中国的衰落，就必须懂得中国早先取得的成就，因为这种成就之大竟使得中国的领袖人物对于灾难的降临毫无准备。”^①

这么多思想家、政治家的论述说明了什么呢？

马克思预言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要在中西文化冲突、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抗中死去。历史进程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正如费正清所说的：“回顾起来，中国在19世纪的经历成了一出完全的悲剧，成了一次确是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崩溃和衰落过程。这场悲剧是如此缓慢、无情而又彻底，因而它就愈加痛苦。旧秩序为自卫而战，它缓慢地退却，但始终处于劣势；灾难接踵而至，一次比一次厉害，直到中国对外国人的妄自尊大、北京皇帝的中央集权、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观念，以及由士大夫所组成的统治上层等事物，一个接一个被破坏或被摧毁为止。”^②

①（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第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② 同上书，上卷第4页。

费正清和马克思都认为是“天朝王国”观念导致清王朝衰落、死去。马克思说清王朝“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费正清则讲中国先前的“成就之大竟使得中国的领袖人物对于灾难的降临毫无准备”，“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他们俩讲的与拿破仑说的大致是一个意思——雄狮沉睡——沉睡在天朝王国的梦境中，其下场必然是衰落和死亡。

黑格尔是辩证法的大师，说中国的历史是没有历史的。在他看来中国的历史只是君主兴起——覆灭的一再重复，没有发展，没有变化，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换言之，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开启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法国人阿兰·佩雷菲特与黑格尔的见识是不一样的。他在回答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国为什么竟成为世界上最落后、最贫穷的国家这个问题时，说出了一段非常深刻的话。他讲当时的英国尽管国土有限，人口不多，却出于商品经济、机械化及革命而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所有这些在大陆欧洲还处于摸索阶段。中国在当时也达到了鼎盛时期。“如果这两个世界当时增加接触，相互吸取对方最成功的经验；如果那个比其他国家早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术和造纸，指南针和舵，炸药和火器的国家同那个刚刚驯服了蒸汽，并即将制服电力的国家把各自的发明融合起来，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信息和技术交流必将使双方的进步源源不断。这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啊！……”^①

在佩雷菲特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是可以与西方文化

^① 《停滞的帝国》第19页。

相结合的，而且这种结合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文化革命，将使人类文明造成源源不断的进步。17世纪具备了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条件。是西方、是英国这个领先于欧洲大陆、首先完成近代工业革命的国家向东方、向中国发出了交流的信息，但是聋子——地球上最强大的聋子——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没有理解这个信息，错过了历史赋予中国和西方交流的机会。中国的落后开始于乾隆的后期；18世纪中国的衰落根本原因在于乾隆皇帝没有把握历史的机遇；而错失历史机遇的根子，就是“天朝王国”的观念蒙住了人们的眼睛，使国人无视世界的发展、西方的进步，仍沉睡于世界唯一文明国家的梦境中。

二、华夏夷狄说和天朝王国论

“天朝王国”观念使古老的帝国成为聋子，没有理会西方向东方发出交流的信息，错过了中国和西方交流的历史机遇。历史的成就造成历史的衰落，是借助于天朝王国的观念得以实现的。

“天朝王国”的观念是对天朝王国实际的反映，它有扎实的基础和实际内容。18世纪中国的版图东至大海，南至百越，西至葱岭，北至大漠，在东亚大陆上已达到当时的交通可能达到的极限。人口已经超过了3亿，几乎为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的2倍。国内市场和国内贸易也远远超过欧洲。

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方法也达到当时历史条件（封建主义）下的极致。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以及有效地与此相联系的神权、王权、父权三位一体的政治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准则，使中央政府依靠很小的官吏队

伍却有效地管理辽阔的版图和众多的人民。

精耕细作的农业和发达的手工业，创造了农业文明，使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得以长足的进步并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些是人们形成“天朝王国”观念的基础。

“天朝王国”观念又是对外关系的产物。了解自己要通过他人，通过他人这面镜子，才能认识自己。国家也一样，中国的“天朝王国”观念在18世纪前是通过对外关系中得到确认和强化的。从他国的镜子中看到自己的伟大和富强。

中国与四周相邻的国家长期存在着“封贡”关系。邻国封建王朝的帝王要受中国封建王朝皇帝的册封才能“名正言顺”。每当邻国新王即位时，新王须派使臣到中国，请求册封，并奉王朔，得到中国王朝的承认，这是中国对邻国的所谓“封”。邻国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定期向中国封建统治者“朝贡”，贡品大多是本国的土特产品和珍稀宝物，这是邻国对中国的所谓“贡”。这种“封贡”关系，一方面表示“天朝”的尊严，其“圣德”可以“育化四夷”，不必以武力来维持“天朝”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邻国则表示沐受中华文化，“万邦倾心内向”，惟中国为“天朝王国”。

这种“封贡”关系，是两国间由于双方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需要建立起来的，是根据传统或双方默认而确定的一种松散关系。“中国属邦，无不以保护之责”，即中国对“藩属国”有保护的义务，“藩属国”以自愿求得中国的保护为基本国策。“夫小国之恃大国，以其能救患恤灾”，即中国在“藩属国”有灾有难时要给予经济上的“抚恤”，使“藩属国”从经济上获得支持和利益。藩属国“自己管理国政，不受干涉”，中国不干涉内政，但在经济

上要给予大量的援助，政治军事上要给予支持和保护。一方是“怀柔远人”，“育化四夷”；另一方是“万邦倾心内向”，沐受中华文化。中国从这种“封贡”关系中看到了“天朝王国”的地位，体验到“天朝王国”的尊荣和声誉。

“天朝王国”的理论基础是“华夷”论。华指华夏。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即华美。华夏谓中国。中国在东亚以至全世界，是最早诞生的文明之区，是礼仪具备、文章华美之域，所以华夏又指称文明开化礼仪具备之民族。夷是古代中国对周边各族的泛称。所谓“西戎、北狄、南蛮、东夷”。这些夷狄是围绕、散落在中国周边的民族与国家。它们是中国文明向四周辐射的被辐射地，均受中国文明的统合和滋润。对于这种文化辐射作用，《孟子》以“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也”表达之。

对于这种“华夷”观，日本等周边民族和国家在18世纪前也都是认同的。日本在历史上被中国称为“东夷”，日本人也自称是中国的东夷，只是优越于西夷、北夷和南夷的东夷。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与中国同属君子国，日本人的祖先是周代贤人泰伯的后裔；中国人称日本为东夷，其他方位的民族和国家以戎、狄、蛮称之，这些字的结构中都含有“犬”字、“虫”字，只有“夷”字其中支撑着一个“人”字，日本是不同于西戎、北狄、南蛮的文明之国，并非一般野蛮之国。

日本学者还说：中国名四夷为夷狄，较中华为贱，乃无礼义故也。然若中华之人无礼义，也必与夷狄同。反之，四夷之人若备礼义则必与中华之人无异。这是说，是不是夷狄，关键看是否具备中华之礼义。如果具备了中华礼义，那就不是夷狄，而是华夏了。这种以礼义区别文明与野蛮、蛮夷与华夏的观念在中国更是根深蒂固。礼义是做

华夏人之根本，是万万不可弃的。用夏变夷就是用华夏礼义去感化夷狄，并非武力的征服，也非“奇技淫巧”的诱惑。

这种华夏高于夷狄的华夷论，为“天朝王国”说提供了直接的论证。

“天朝王国”观念在欧洲也有它的市场。18世纪前，整个欧洲都对中国的着迷。欧洲用中国瓷盅喝中国茶，中国漆器作为学生的文具盒，中国园林的小桥流水进入法国贵族家庭的后花园，中国图案的装饰布价值千金，拥有中国的瓷器、红木家具和丝绸是欧洲人尊贵和富有的象征。欧洲上流社会的贵夫人、佳小姐以及女王都喜欢穿中国服装出现在社交场合，许多达官贵人家庭充满了中国的东西。路易一塞巴斯蒂安·梅西埃说：“中国瓷器是多么可悲的奢侈品！一只猫用它的爪子一拨比好几百亩土地受了灾还糟。”^①当时的欧洲以中国为时髦，把中国的生活方式称为“中国模式”。

欧洲的知识界对中国也顶礼膜拜。莱布尼兹建议西方君主都应该向中国学习，请中国的文人来，并派西方的文人去那里，以发现普遍真理并从中产生奇妙的和谐。他还建议仿造中国形象文字创造出一种为各国人民所理解的文字。奥利佛·戈德史密斯在1762年发表的《中国人信札》中，以“中国间谍”带着满清官员周游欧洲并对欧洲所见所闻发表看法的形式，对欧洲提出批评，使欧洲人对照中国的生活模式感觉到自己风俗的不适应的地方。“中国模式”成为欧洲人力争效仿的榜样。在许多欧洲人看来，在中国那古老的帝国土地上，存在一种由人们自己

^① 《停滞的帝国》第30页。

管理自己和由理性管理人的模式。没有宗教，没有教会，完全是自由思想的绿色天堂。这种模式只要照搬到欧洲就可以了。伏尔泰甚至不无错误地说，中国君王的身边都是文人，在人民苛求的目光注视下，文人的意见、甚至是责备他的意见都会认真听取。法国的重农主义者极为赞赏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和专制制度。著名的经济学家魁奈把中国的天地和谐、天人合一、重农抑商的思想引为自己理论的知己。欧洲人把中国说得奇妙无比，是富裕、平静、安全、讲求艺术研究的天朝。欧洲人的崇中媚外的心态掩盖了一些欧洲人对中国的批评，“天朝王国”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头脑中，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也是“天朝王国”。

这种基于客观实际的、被中外所普遍认同的“天朝王国”观念，使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知识分子、各级官僚以及皇帝形成了中国的世界观：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是中央之国，是“礼乐教化、尧天舜日”之地，外域则是不识礼义的蛮夷之邦。这种认识直接导致两种政策上的失误。其一，把那些远离本土、走向世界的中国人看成是背离文明、忘记祖宗的不孝子民，而置之海外，不问不管。1740年东印度荷兰公司对现印度尼西亚的华人进行残酷的屠杀，据说几个小时内就屠杀了3万多中国人。东印度荷兰公司的董事们深恐因此得罪中国皇帝，害怕中国对他们在广州的人进行报复，于是派使团说明事由并表示道歉。乾隆皇帝竟毫无介意地让人答复：我对于那些贪图发财远离祖国，舍弃自己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这种历史的失误所造成的影响一直沿续到今天。以至于伏尔泰对中国作出不无偏见的结论：“当法律不准一个公民离开自己偶然出生的那块国土时，这个法律的

含义是很明显的：‘这个国家管理得如此糟糕以致我们禁止任何人出境，免得所有的人都移居国外。’”^①其二，把外国都看成是蛮夷，中国与蛮夷的关系只是“封贡”关系，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如来，要尊中国为上国而自以为藩属。外夷如遵循这种“封贡”关系，天朝就施恩给他们，许他们与中国做买卖，这是中国对外的抚夷政策。如果他们不遵循“封贡”关系，敢有非为，冒犯“天朝王国”，天朝就用武力进行“剿夷”。“抚夷”和“剿夷”成为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两大基础政策。18世纪后的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抚夷”和“剿夷”根本应付不了复杂的中外关系。

三、礼仪之争的背后是平等地位之争

国民党时代曾任中国驻苏大使的蒋廷黻在1938年讲过这样的话：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此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18世纪下半叶已成为全球性强国的大英帝国，为了打开中国的商业大门，多次派出使者，不顾大洋的惊涛骇浪，不顾万里远航的千难万险要到中国来。这是大英帝国富有战略眼光的行动，是为未来投资的壮举，也是为沟通中西文化联系的远航，当然也是一次带有殖民主义倾向为开拓新殖民地的准备。

早在1787年，英王乔治三世，任命加茨卡特为特使访华。乔治三世要访华使团消除英国在华贸易所受到的

^① 《停滞的帝国》第49页。

限制，说明英国志在通商，强调两国贸易是互利的；向中国请求割让一块土地或岛屿作为货栈之用，享有与葡萄牙一样对澳门的权利，建立互换使臣制度。加茨卡特后来在来华途中病死，英国出使中国的第一次行动夭折了。

1792年9月，英王乔治三世又向中国派通使团。使团由曾任驻俄大使、印度马德拉斯和加勒比总督的马夏尔尼为首领，乔治·斯当东辅佐他的工作。使团人员多达100来人，包括外交官、年轻的英国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加上水手则有近700人。使团乘坐拥有64门火炮的战舰“狮子”号，1200吨的三桅船“印度斯坦”号和一艘小型护卫舰“豺狼”号。这是英国从未派过的庞大使团，欧洲也从未派过同样规模的使团。为显示英国的强大和科学技术的先进，使团把英国最新发明的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还有现代炮兵武器装备作为礼品赠送给中国。直接送给中国皇帝的礼品有天体运行仪、地球仪、望远镜、秒表、韦奇伍德瓷器、帕克透镜、削铁而不卷刃的利剑等最新奇最时髦的东西。

1792年9月26日，马夏尔尼率领的使团舰队驶离英国朴次茅斯港前，英国已在4月份通过东印度公司派特使向中国政府传达使团来华的目的。特使的信中写道：英王陛下为了增进两个朝廷间的友好往来，为了发展于两国都有利的贸易关系，决定派遣他亲爱的代表——马夏尔尼勋爵为全权特使赴北京访问。英国内务部部长敦达斯对马夏尔尼使华下达了正式的指示：您一到便要受到接见，你要服从中国朝廷的礼仪，既不损害自己君主的尊严，又不要被礼节上的小事束缚住手脚。在强调为英国贸易打开中国市场这个中心任务外，敦达斯还要求在不起中国人怀疑的条件下，使团应该什么都看看，并对中国

的实力作出准确的估计。

这时的英国是强大的，是当时的超级大国。乔治三世以世界西方的代表自居，以占据地球的西半球为荣。“桀骜不驯的目光，举止高傲；我眼前走过人类的统治者。”“统治吧，英国；英国，统治那浩浩的浪波。”这些诗句是对800万英国人以及英在世界扩张情形的描述。这种高傲的举止、统治世界的野心，决定了他们一定要打开世界上最古老、幅员最辽阔、人口最多的帝国大门；这种高傲的举止、统治世界的野心，注定马戛尔尼使华的失败。马戛尔尼知道，自有中国以来，中国高人一等就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原则。中国把受中华文明熏陶程度的不同而区分为“熟番”和“生番”。“熟番”是指服从天命，受中华文明同化的外国人；未能接受中华文明或不愿接受中华文明的人，就是“生番”了。对英国文明毫无认识甚至把他们当做“生番”的高傲的中国人，遇到同样高傲的对中国不甚了了的英国人自然会生出许多误会性的对立和骨子里的对抗。

马戛尔尼船队经过9个月的艰苦远航终于在1793年6月20日到达中国澳门海面。10月11日他们才获准与海关总督会晤，18日会见广东巡抚郭世勋。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对英使团使华也非常重视，他要地方官员及时奏报英国人的情况。对于18日与马戛尔尼的会晤，郭世勋禀报了乾隆皇帝：英吉利国夷人来广东求赴总督即奥海关衙门具禀事件，臣当即会同使见。称系该国王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今遣使臣马戛尔尼进贡。惟是外夷各国凡遇进贡俱由例准进口省份分先将例表贡单呈明督抚。该国王又无例表贡单照会到臣，所递禀礼仪据该国管理买卖头目差遣赍投，臣等未便冒昧遽行具奏。郭世勋的